

中欧社会论坛成都多主题对话

S15a-新闻工作者与责任小组讨论

一：经验分享：

三畏：

关于新闻管制，所有的成员都很关注。我来开会前，韩寒的杂志《独唱团》出版后，几个小时内成都街头就断货了。我觉得媒体应该把这件事当作一件文化事件或社会事件来报道，而不是当作一个娱乐趣闻。我跟媒体主编建议，应该派出记者专访韩寒。我刚告诉报社的同事，他们就告诉我们，上面已经有通知了，这件事媒体不能炒作。

展江：

三天以前，我和广州一家报纸合作，组织了两版的文章。主要内容是伯尔基金会委托德国两所大学，对德国媒体 2008 年涉华报道所做的研究。他们研究的结果在 6 月 14 日发布，被多数有关中国媒体曲解，其中最厉害的要数《环球时报》，也包括新华社。这些报道不但混淆了视听，也给伯尔基金会造成了一些尴尬。因为德方有人认为，基金会是在给中国做宣传。上周，我们和基金会一起，把他们的看法，他们调查的主要内容，通过《时代周报》的两版文章重新解释和澄清了一下，尤其是对《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的一些曲解进行了温和的批评。伯尔基金会的结论是，德国媒体不存在反对中国的阴谋，但他们可能也有一些问题。而在中国，有一些媒体就可能存在故意歪曲他人观点的问题。

周晓翔：

记者的独立性是有限的独立。我们曾有这样一件事：有个药店卖一种药，把一种毒药当作是一种清火的药卖给了病人，导致病人的瘫痪。我们报道后，导致了医院的关门。医院找到我，我认为必须秉直记者的良知，把这件事报道下去。但他们通过宣传部等机构，把报道压下来了。虽然最后的判决，他们败诉。但这件事的过程中，记者的独立性在中国现实的制度下是有限的。但是，有限的独立，不等于记者不应该追求独立。记者的独立是一种理想，但独立能否实现，实现到什么程度，取决于记者所在的制度环境。

唐建光：

记者的伦理底线取决于媒体的伦理底线。我当时效力的《中国新闻周刊》，接到了一个合作项目。一个公司与刊物合作一个人物栏目，要求报道一些成功人物。刊物主编认为，合作这个栏目，对报道对象的筛选必须由杂志来确立标准。最终也是由刊物和赞助方通过协商，来确定人选。记者要去采访，也不是基于自己的职业判断。既然我们服务的媒体，都在以他们所在的版面在与利益作交换，怎么能要求记者超越媒体环境去按照职业标准来客观报道。

：（志愿者：王妍 13880181083）

我想就社会转型来说几点，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正处于从共产主义到一个更自由的时代。我想说，在巴黎郊区，有很多来自北非的居民。他们在郊区有一些生活状况的问题，他们不满当局对他们的待遇。有一些瑞士媒体，他们对这方面做了一些报道，他们在网站上建立了博客，并在网上发布一些信息。博客的名字叫“bandi t”（音译）。

从 05 年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一些骚乱。一些年轻人向警察扔石块。

法国政府也经历了痛苦的时期。

这样的话，就使得平时根本没机会说话的，有机会会有平台发表自己的意见。通常来说，发表这样的信息在传统媒体是非常困难的。而在网络上，就很容易了。这个博客能够意识到郊区到底发生了什么，让那些没有机会发言的人能够发表自己的看法。

海燕：

08年时，广州环保运动非常活跃。其中一次是番禺居民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另一个是在石坑（李坑）居民反对垃圾焚烧厂。番禺是发生在一些新兴的居民，住户多为新兴的中产阶级。而李坑则是一个城乡结合带，居住的都是一些被边缘化的城市农民。两个地方都在反对，但结果却迥然不同。在一些社会人士和媒体的参与下，番禺的项目取消，而石坑的还在继续进行。

我好奇的是，番禺的项目为什么能被取消，是哪些力量在起作用。后来我发现，记者其实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悄悄转变为一个精英群体，成为城市的中产阶级，而他们手中掌握着媒体，他们有为自已代言的工具。他们用这个工具去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而石坑这个地方的居民，他们是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没有自己的媒体，没有象记者那样的公共资源，因而他们的抵制失败了。

王琳：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宗个案。2009年5月初，轰动全国的宜宾国税局白花分局原局长卢玉敏“嫖宿幼女案”有了处理结果。宜宾警方认为：卢玉敏事前并不知道被害人未满14周岁，因此，卢玉敏“不构成犯罪”，决定对其处以罚款5000元，行政拘留15天。

5月11日，《羊城晚报》的编辑通过电话向我约稿，我分析了这个案件后，认为警方处理的最主要的法律依据已经失去了法律效力。为此我写了一篇时评《局长“买处案”适法错误》，发表在5月12日的《羊城晚报》上。当时的媒体上只有我对这一个案发表了法律适用错误的质疑。5月13日，宜宾市纪委一位工作人员给我发表邮件，请我在法律适用上提供具体的文件。之后，这一文件得到确认。案件由此急转直下，8月3日，卢玉敏法院判定构成强奸罪，并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我想通过这个案例，说明记者职业化和专业化的需要。同时我也想证明，观点新闻（如时评）在中国虽然经常无力，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纠正政府或司法的错误。媒体、记者、评论员都应承担起这种责任。

江雪：

我来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第一个，有一个官员向华商报投入了一笔钱，想要发一篇软文。我当时在深度报道部，我想这不是一个记者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拒绝。后来报社安排了另一个记者去，但他问了一些广告商不高兴的问题，结果大家不欢而散。我们讨论媒体和记者的底线，包括在权力面前保持独立性，不应因广告利益而回避公共利益。但在中国当前的情境里，媒体比较难以做到。但对于记者来说，并不是没有办法，记者可以主动拒绝这些事情。比如提出一些理由，来拒绝这些工作。

另一个案例是一个自杀案件的报道。在西安东郊，有近20万的下岗工人。有一个工人自杀后，他的工资存折里只有1元块。他还要应付孩子、医疗等等压力。我在报道的时候，我的思考是：一是报道要考虑对其他相似人群的影响；二是报道会不会引发老左派攻击市场经济等改革。

蒋冰：

我是做手机媒体的。在我看来，传统媒体对农民的启蒙是没有的。不仅是媒体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也是基于读者群体的考虑。周晓翔老师曾说手机报的读者层次太低，但我们是否因为这些人的层次太低，就把他们排除在媒体的受众之外。传统媒体忽略的人群，给手机媒体的出现提供了机遇。从建国到现在，没有一份媒体可以直接送到农民手中。而手机报恰恰可以送到农民手中。我有一个理想，创办一个服务三农的手机报，类似于乡村学校的项目，担负起对农民启蒙的责任。

翟明磊：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在网络管制和新闻自由方面的一些经历。2005年，我跟一些朋友创办了一份独立的刊物《民间》。因为报道政府在征用土地时农民与政府之间矛盾遭到停刊。我就发表了一个“《民间》停刊告读者书”，对政府的新闻管制提出了一些批评，我马上就受到了抄家的命运。但这时我接到了一百多个电话和短信，远到西班牙的记者。当时各国记者都有采访。这对我起了一些保护作用。后来我创办了《壹报》，有了比传统媒体更大的发表尺度。《南方都市报》发表不了的文章，也可以在我这个博客上发表。我的这个博客曾四次被屏蔽。第一次屏蔽后，我在网志大会上抗议，政府不应该掠夺我的网络“房地产”。后政府也有开屏。随后我写了个政治笑话，又被屏蔽。再次抗议之后，又再次开屏。当时我写了篇文章《壹报开屏不是春，百博齐开春满园》，建议政府为被封闭的博客一一开博，一天之后又被屏蔽。再后来，我为朋友异见人士胡佳鸣冤，博客被彻底屏蔽。那时我发誓，如果关我一个博客，我就开两个。如果关我两个博客，我就开四个。所以我后来建立了四个博客，三个在海外，一个在国内。在国内的博客经常被删帖。有一次一篇文章只存活了一晚上就被删帖，我就写了一篇日志，叫《我的一夜情》。因为这个标题，有很多人来看，也有很多人在传阅。之后，另一篇文章被删，我问了很多人包括管理者，他们都说不是他们删除的。后来我明白，我的帖子是被外星人删除了。于是我就给外星人写了一封抗议信，这封信也留传甚广。

后来我做过四川汶川地震预测的系列深度调查文章，如其中有发现龙门山脉地震带发出过地震预报卡，四川地震局置之不理。曾经德阳地震局的五个局长站在专家面前，通过电话要求我删除我博客上的文章。我回答，我不是中宣部管的记者，所以不受中宣部规定的管制。综上，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体会，对新闻管制最好的斗争方式，就是曝光。在一个非正常的时代，公民能勇敢发声，公民之间相互呼应是非常重要的。这样能通过增加管制的成本，来打破和突破新闻管制。

：

在法国，对一个议员或一个政府官员，他们去批评记者或给记者红包，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他们有一些更加聪明的行贿方法。我叫他“社会贿赂”。一个反对党的部长会找你，把你当作他的朋友。他叫你小名，然后他说“您”，不说“你”。然后他请你吃饭。总的来说，就是一种聪明的方法，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他让你觉得如果说他的坏话，你会觉得不舒服。我回到巴黎才发现这一现象。后来我成了《世界报》的主编，我立马就被一个规则盯上了。我不接受任何部长、议员或大人物的电话。我从来没有和有正式关系的人在一起吃饭或一起旅行。我在三年之中一直都遵守这个规则。并不是说我想保护我自己，而是想保护记者。通过这种方法，我避免了可能颠覆法国记者伦理的错误方式，避免了不是经济上的腐败、但也是腐败的情形。

郭妮：

我想说关于我在中国 80 年代采访的一些经验，就是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需要一些非常高的责任感，就是对他们采访对象的保护。我觉得到现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到现在我已经做了 13 年的编辑。基本上，我在你们的报业里面找到了一些能够反应中国现状和中国变化的稿子。

比如说，你们给中国读者写东西，你们根本不必要写清楚，如果我不清楚的话，法国读者就会看不懂。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知道，你们遇到了多大的困难，我们也清楚地知道你们所发表的东西并不是全部的事实。我们能看到这一点，我们其实很清楚。比如从外面来看，都能够看到你们哪儿没写完，哪儿被删除了。两年内，我亲眼看到了两次有的文章前一秒还有，后一秒钟后就没了。一次是奥巴马与中国青年对话的消息，一次是 13 家媒体共同社论。把这些说清楚，点你们的名，是比较难做到的。因为毕竟我们应该解释情况，我们解释情况的时候，又会点到你们。

：

我讲第四个问题。讲社会转型，而且是政治转型。政治改革正在我的国家比利时发生。在比利时有两个区，一个说法语，一个说荷兰语。我想说的事情发生在法语区。近几年来，比利时说荷兰语的人们越来越需要更多的独立，在比利时内部的独立性，需要更清晰地区分两个区。所以我说比利时这个国家结束，它想分裂成两个国家。这几年来，比利时法语区的当局一直都屏掉这个消息。

我们在 2006 年发表了一个录像。在 2006 年 11 月份，我的电视台同事制作一个记录片叫《比利时再见》。为什么它很有趣呢？因为里面全是假的，但它又那么真实以致所有人都相信了。它是可能的，是允许发生的。在一个新的思考方式下，它是可行的。

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看法。一种消极的方法就是，更加促进了他们之间的区别更加明显。这就是比利时这个社会在寻找一种思想的大碰撞。我不能用短短的几秒钟就向你们解释好制作这个记录片所花费的精力。假如是现在是晚上八点，所有的电视节目都是很正常的。突然我们中断了信号，一个主持人说，比利时时代已结束了。或许几年后真的有人就宣布比利时结束了。

长平：

我回应怎样抵制和突破新闻管制。我以前做记者、编辑、新闻主管和主编，现在写评论和专栏。我给自己的任务之一就是不断探索管制的边界。有人经常问，中国媒体的空间有多？。我总是回答，如果不去试探，就不可能知道。但我不希望那么激烈，因为我希望我的文章能让更多中国人都看到。但我也经常遇到一些新的管制，不知道怎么办。比如说，曾经并网站发表我的作品，他们就会被罚款。再如 08 年我写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时，引发了很多五毛党人的谩骂。直到现在，几乎我的每一篇文章后面，都有这些人在谩骂。这些事情让我很烦。法国世界报前主编刚才讲，他拒绝和政客吃饭，但在中国很多主编都希望接到饭局的邀请。我批评云南省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后，收到了他转发给我的很多材料，我也有些不好意思了。不过后来我又写了文章批评他。

今年两会期间发生了“鸿忠事件”，湖北省长李鸿忠因为一位女记者问了尖锐问题而抢走了她的录音笔。我写了分析文章，发表在 FT 中文网。但很快，我在湖北省《长江日报》的专栏就被停了。据编辑说，这可能是总编的主动选择。对这些事情，我没有办法。

我相信很多中国人都像我一样，对威胁感到恐惧，对管制没有办法，甚至看不到前途。但是

我希望，无论眼前如何黑暗，无论未来如何渺茫，大家也要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不可能中探索可能。

小华：

08 年时，我写了一篇文章，涉及到一个敏感的项目。当时还有一些市民以“散步”的方式来反抗，当局还抓了人。

成都川西平原能可持续发展的

成都市宣传部注意到了这个论坛中，有这样一篇文章写这个敏感的项目。随后就有人找到我。包括会议方和我的单位都有人来找我。

来人宣称他是项目办的人，他们向我陈述这个项目的一些好处。

我的回应是，为什么不将这些项目的有利方面告诉民众呢？他们说，我们也很为难，因为公众不相信我们，公众不相信官员，公众不相信专家。

我的疑惑是，这是为什么？

晚上：

我对当下中国的新闻环境并不抱乐观的想象，包括你们所提出的一些想象。有些时候我也会讲，包括我遇到一些惩罚和攻击的时候，我也会害怕。我几次因为写文章丢了工作，我也很难过。

我们还得往前走，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极其困难中积极去做。

江雪

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当人们谈到记者的时候，不会再想到“红包”这个词。

王琳：

我的理想是当记者遭到非法侵害的时候，能够很迅速地得到社会组织的帮助，包括经济上、精神上的和法律上的帮助。

具体的做法也许可以分步完成。虽然我和多数人一样，也认为成立

蒋冰：

我的理想就是创办一份“三农手机报”，它不一定会得到所有人的喜欢，但它的栏目、它的设置、它的内容是多数农民所喜欢的。

我希望有一个国际性的规范，禁止警察和法院调查记者的消息来源。

郭妮：我非常希望有一天，中国记者和西方记者来谈他们的情况，他们能够在比较平衡和平等的情况下，来做他们的工作。比如说，他们完全可以在同样的条件下，要么一起去采访，去做同一个报道，一点都不会遇到麻烦。

你们叫我去想象一个关于未来，关于理想。这是合理的，但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可能。我们昨天谈了很多，今天也谈到了一点，就是记者怎样在经济上获得独立。我们并不是为了钱而工作，是为了独立。全世界的记者联合起来。

小华：每个人都能拥有期待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而不会得到喝茶的待遇。我希望这一天不会太远。

三畏：我愿意为明磊的畅想添一点注脚。他的畅想，在我们听起来都象一首诗，但我想，这个畅想的实现

象我和长平先生写专栏，署自己的名，就自己负责任。

展江：

我们既不需要宣传部，也不需要象王克勤这样的调查记者。我希望调查记者都失业，所有的腐败现象都不由媒体来承担揭露的任务。

二：关键问题：

1. 怎样确保记者不能跟着金钱与权利走，记者应建立伦理底线，反对任何形式的贿赂？
2. 怎样抵制和突破传统与新形式的管制和宣传？
3. 怎样再经济上和法律上对调查报道与国家报道给予支持？
4. 媒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角色与作用是什么？
5. 怎样确保记者明确自身权利与义务并完全独立履行？

三、解决方案和展望

周晓翔：我希望记者的采访本可以作为证据被法庭采用。这在西方国家早已执行，这一直是我的憧憬。

王海燕：希望记者之间有互相交流的平台，广州就有一个记者进行交流的 BAR。

瑞士时代周报：我有三个词总结。第一是“质量”，报道要有事实、有质量，才能让人信服；第二是“团结”，记者通过网络互相支持，互相了解；第三是“谦逊”，记者和媒体掌握了话语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拥有了权力，因此记者必须保持谦逊，不应把权力和反权力混淆，这一点很重要。

长平：中国媒体现状不乐观。我本人遇到惩罚的时候内心会害怕，被网民攻击的时候会难受。但还是要往前走，虽然可能会有困难，但个人要按自己的良知做事。

王琳：在目前中国成立记者工会的可能性比较小，但可以成立一些维权组织基金会，律师可以加入，帮助记者维权。这是现实可行的方案。

江雪：我希望将来人们说到中国记者的时候，说起的不再是红包。

蒋冰：希望看到一份《三农手机报》的诞生，让媒体可以真正影响到农民和弱势者。

翟明磊：现性是言论自由市场的唯一货币（下面没记得下来，可以问一下他进行补充）

国际报：我希望有一个国际性的规范，保护记者，不许警察去查记者和信息的来源。

郭妮：希望有一天中方和西方的记者，可以在平等的平台一起采访，一起讨论，可以做同样的报道，而不会遇到麻烦。

比时利：记者能够在经济上独立，不是因为钱而工作，而是因为独立。全世界记者应该联合起来。

彭小华：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而不会受到喝茶待遇。

何三畏：希望五到十年内，有那么一天，我的博客署我自己的名字，博客也只能让我负责，不会有任何人去帮我管理，不会有人敢删我的博客，如果有，我就可以告他。在纸媒上，我也署自己的名字，编辑不会删除我的观点。

展江：中国很复杂，我希望未来既不需要宣传部，也不需要王克勤。希望到时所有的调查记者都失业。

四、可行性方案

1、小组框架内，中欧双方互相加强交流，制定交流原则，然后变成行动，定期进行中欧媒体记者交流。

2、经验分享。在中欧论坛目前的网站上设分栏目，中欧双方的记者都可以多发表文章，集合经验，实现理想。让所有人都可以分享。

3、中国有质量的文章可以多翻译到欧洲，被更多的媒体采纳和发表。可以做一个网站，把更多的信息提供给大众，介绍给更多的读者群体。

4、目前中国面临去正义化的功利教育。要让更多的记者相信，按原则做事不会吃亏。

5、在中欧论坛网站成立了网站，多翻译一些欧洲新闻自由与法制、管制的文章放到网上，由欧洲提供一些经验，然后由中文的专家学者借鉴以后，起草立法，促进中国媒体进步与法制。

提出关切问题：

- 怎样确保记者不跟着金钱与权力走，记者应建立伦理底线，反对任何形式的贿赂
- 怎样抵制和突破传统与新形式的管制和宣传？
- 怎样在经济上和法律上调查报道和国际报道给予支持？
- 媒体在社会转型期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
- 怎样确保记者明确自身权利和义务并完全独立履行？

建议行动方案：

- 促进有利于新闻媒体独立的立法和司法改革，同时，加强媒体和新闻从业者的行业自律。
- 制定一套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新闻职业伦理规范。
- 中欧双方共同搭建一个多语言的网络互动平台，建立中欧双方媒体从业人员互换、交流的机制。

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

- 在中欧双方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如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媒体的新闻自由？
- 欧洲在新闻立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供中国研究和借鉴。
- 在欧洲，参与民主非常活跃，完全可以引荐到中国来，进一步推动中国正在兴起的媒体驱动型的公民参与。
- 欧洲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建议深入到社会转型的各个方面，避免欧洲中心主义。中国媒体也要避免对欧洲报道中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彼此坚持新闻的客观性，避免刻板成见。